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陕县党史资料

(第五辑)

纪念八一建军60周年全国解放战争
转入战略反攻暨陕县解放40周年



中共陕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八月



发扬前辈革命传统，
加速陕西的现代化建设。

纪念陕西解放
四十周年

邓 莹

前 言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又是陈谢大军挺进豫西、陕县首次解放四十周年。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事,也是陕县党史上的大事。

四十年前,在全国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之时,陈谢大军挺进豫西,一举解放陕州城。从此,陕县人民摆脱了黑暗,迎来了光明,做了历史的主人。今天,我们重读解放陕县的生动史料,仿佛看到了当年攻城战斗的炮火硝烟,听到了英雄战士的冲锋呐喊。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溯陕县解放的历史,要以史为鉴,用当年战略大反攻的英雄气概,无坚不摧的精神,克敌制胜的勇气,战胜困难的决心,激励我们建设四化,促进改革、开放、搞活和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党员和广大干部的素质。这是编印本辑的目的。

诚望当年的老同志及读者指正。

编 者

1987年8月

目 录

中共陕县县委书记邓堂同志的题词

前言

〔专题转载〕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情况的调查报告·····	(1)
------------------------	-----

〔组织史资料〕

陕州城第一次解放前后陕县党政军机构 组建情况简介·····	(12)
----------------------------------	------

〔书刊资料〕

历史的进军 (节选) ·····	(15)
灵陕之役·····	(21)
横扫陇海西段·····	(27)
冲进陕州城·····	(32)
三十八军的勇士们·····	(34)

〔前线电讯〕

陈谢大军攻克陕县再歼蒋匪 一旅二团·····	(37)
解放灵宝、陕县战果·····	(38)
灵宝、陕县群众获得解放后自动组织 起来分粮分田·····	(39)
前线记者的报道与评论·····	(40)

〔 军史选摘 〕

陕州攻坚战斗..... (43)

陕州战斗..... (46)

〔 回忆录 〕

忆陈赓兵团挺进豫西解放陕灵的一些片断.....赵群一 (47)

护送陕县同志.....王万有 (52)

〔 史实考证 〕

陈谢大军解放陕州歼敌人数考..... (55)

〔 历史资料 〕

蔡迈轮《黎明前的日记》选载.....(61)

陕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十项布告..... (65)

〔 国民党档案资料 〕

陕县警察局民国三十六年九至十二月份工作报告书.....(6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是中共党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但是，对于南昌起义的决定情况，党史界及有关著作说法不一。为了弄清这个大是大非，中央党史征委将它列为一个专题，由江西党史征委调查考证。江西党史征委很快完成了这个专题，上报中央。在纪念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之际，特将这个专题调查报告予以刊载，使同志们了解决定南昌起义的真实情况。

——编者

关于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的 调 查 报 告

南昌起义是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关于何时何地在哪次会议上决定南昌起义的问题，目前党史界说法不一，我们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资料就作出南昌起义决定的情况进行了考证，结果如下：

一、几种不同说法和我们的考证结论

关于何时何地在哪次会议上决定南昌起义的问题，目前党史学界大体有两种意见：

张侠在《胜利的起义，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从几个问题看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1）一文中认为，南昌起义是党中央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反复讨论后，于七月十八日在武汉决定的。理由主要是：早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和七月上旬，针对国民党反动派

的屠杀政策,我党有很多同志主张武装反抗,蔡和森、周恩来、毛泽东、恽代英、任弼时、叶挺等同志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七月上旬,我党基本上排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已成为主流。七月十三日,我党发表了《对政局宣言》。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敌人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分子。大约在七月十五日之后的几天之内,周恩来批驳了西去四川的主张,确定了“以湘鄂赣为中心”的大方向。七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共同商讨,提出了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的主张。十七日之后,蔡和森也提出了“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建议。“在这些思想酝酿的基础上,中央可能(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是在七月十八日在武汉召开了会议,决定举行南昌暴动。”

罗时叙在《南昌起义的准备会议——“庐山会议”史探》⁽²⁾一文中则认为,南昌起义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庐山会议上决定的,最后由瞿秋白带到了中央,中央最后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其根据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周恩来、李立三两同志的回忆。

一九五九年夏,党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期间,庐山党委书记楼绍明见到了周总理,向他汇报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庐山革命史,总理说:“南昌起义就是在庐山研究决定的。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是在武汉,而如何准备起义是在庐山研究决定。那次会议有李立三、林伯渠等九位同志参加。会议的地点是林伯渠同志的叔叔家里。为什么来庐山开?因为鲍罗廷在庐山。要写这段历史请找立三同志,立三同志比我记得清楚。”

李立三同志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时说：“我记得关于领导南昌起义问题是在庐山会议就研究决定了，其中有周恩来（书记）、张太雷，有我，我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好象还有张国焘（农工）、彭湃（农工副部长），也许这就是党的前敌委员会。当时，鲍罗廷也在那里。”一九六〇年夏，李立三同志来庐山休养，庐山革命史编写组吴志伟、熊侣琴就庐山会议的情况访问了李立三同志。罗时叙的文章引用了时隔二十年（一九八〇年二月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之后吴、熊二人对此所作的追忆。说李立三谈话的大意是：庐山会议确有其事。时间是七月十九日。参加者有鲍罗廷、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林伯渠、叶挺、彭湃、聂荣臻，还有湖南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等九人。南昌起义的计划、领导机构的安排、起义日期，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

我们通过仔细研究历史文献，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与历史事实不符，难以成立。

诚然，南昌起义是我党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反复讨论之后作出的。早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我党很多同志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日益反动，提出过武装暴动的主张。但暴动的地点主要设想在“两湖”地区，而不是南昌；暴动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武装工农群众，而不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这些主张都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的支持。直到七月十二日成立了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离开了中央领导的地位，党内主张暴动的领导人大都参加了五人常委，武装暴动的思想才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直到七月十九日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从武汉动身前，“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3）那时，中央“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

东”，（4）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正如在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文中说：“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时，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5）李立三是七月十二日改组后的临时中央常委，是参与党中央决策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上述文献又是当年所写，应当是可信的。李的说法还可以从《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得到佐证：

“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昌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6）张国焘也是七月十二日改组后的中央五人常委之一。他明确指出南昌暴动是“在浔同志主张”，中央“得悉”是在这之后。这封信也是当年所写，应当是可信的。张太雷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7）李维汉的回忆，（8）都证明了这个事实。同时，张侠的文章说七月十八日党中央开会决定南昌起义仅是“可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只“是笔者的研究与分析，过硬材料没有”。（9）

庐山会议决定南昌起义重大问题之说根据更为不足。周恩来同志并未参加会议，所谈不是亲身经历。李立三同志一九六〇年的回忆看来印象比较模糊，所谈不是“好象”，就是“也许”。拿他这两次回忆同他当年所写的文献对照，出入很大。他当年写的文献指出，在九江召开了多次“会议”，在庐山他和邓中夏只是和瞿秋白“商议”，措词是明确的。翻遍所有历史文献亦无在庐山开会的记载，同时，据历史文献记载，关于南昌起义的纲领、计划、领导机

构的安排、起义日期的确定等重大问题,是在多次会议上经反复讨论才决定的,说一次庐山会议决定了这许多重大问题,显然违背历史的真实。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考证的结论是: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在九江举行的“谈话会”(即九江第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并征得瞿秋白(当时在庐山)同意,由秋白将意见带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七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上午),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电告在庐山的李立三下山,再次举行会议(即九江第二次会议),研究暴动计划,并急电中央请示可否,七月二十四日,中央五人常委决定赞同上述九江同志的意见,并派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赴前敌指导工作。二十五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召集在九江的领导同志开会(即九江第三次会议),最后商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二、决定南昌起义的过程

1、第一次九江会议,提出由“依靠张(奎发)为领袖之回粵运动”改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意见。

“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中央五人常委会于七月十九日派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准备组织北伐军中受我党领导和影响的一部分力量回到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0)

“七月二十日左右”,(11)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在九江举行了一次“谈话会”,(12)到会同志认真分

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13）“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14）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15）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完全相反。”（16）我党“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着重点为引者所加）（17）“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18）同时、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19）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20）只是在谈到请示中央时，由于情况紧急，有人曾“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21）最后仍决定“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22）“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23）

第一次九江会议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原中央常委瞿秋白都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

全赞同这项意见。” (24) 因为听说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的消息，秋白要回武汉开会，李、邓等即请秋白把九江同志的意见代为报告中央，请中央火速决定。同时，聂荣臻也应鲍罗廷之邀，去庐山向鲍介绍了在南昌起义的意见。鲍听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25)

2、第二次九江会议，研究暴动计划。

在李立三、邓中夏去庐山与秋白商议时，谭平山继续留在九江活动。这时，形势更加危急，张发奎态度更加右倾，并得悉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人。七月二十三日，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 (26) 谭平山、叶挺等也立即对贺龙进行争取工作。谭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 (27) 并“将在南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的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 (28) 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 (29) 与贺龙到九江的同一天，恽代英也到九江。 (30) 由于形势危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发电通知仍在庐山的李立三回九江开会。 (31)

七月二十四日，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李立三等在九江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决定叶贺“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 (32) 同时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33)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34) 但在讨论要

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35)

“立三、代英主张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纲领”, (36) 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37)

“中夏、平山又对提出没收土地的政纲 (38) “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的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 (39) 由于“争论极烈”,当时会议无法决定 (两边人数一样)。” (40) 最后“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41)

3、中央常委关于同意南昌暴动的决定。

在第二次九江会议召开前,瞿秋白从九江赶到武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到达武汉。“当时瞿秋白把南昌的决定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 (42) 并“决定”派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43) “指导前敌方面工作 (44) 至于中央常委这次会议的时间,张国焘说是“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之间”, (45) 我们分析是在七月二十四日、最早也不会早于二十三日。因为二十三罗明纳兹才到达武汉;也不会迟至二十五日,因为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已离开武汉到九江。

中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 (46) “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 (47) 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48)

4、第三次九江会议,讨论起义实施计划。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奉命于七月二十五日赶到九江,

立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是为第三次九江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49）乃决定“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50）同时，对于在浔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所出现的分歧，周恩来同志传达“中央的意见”，（51）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52）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第三次九江会议后，周恩来、李立三等负责同志“于二十七日齐集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53）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

5、同张国焘的斗争和关于“八一”起义的最后决定。

七月二十六日，（54）在武汉的中央常委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还有瞿秋白、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代表又举行会议，讨论国际复电，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是否有胜利机会的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的机会，故派张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55）但张国焘“对于张发奎有妥协调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56）二十七日他抵九江后，即召集“贺昌、（高）语罕、（恽）代英、（廖）乾吾、夏曦诸同志会议”（57）报告国际来电内容，要重新讨论南昌暴动问题，遭到恽代英等同志的一致反对，说“再无讨论余地”。（58）同日，前敌在南昌决定：“暴动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准备”。（59）但二十八日暴动军事准备来不及，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60）二十九日，张国焘又两次密电南昌，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时再解决。”（61）三十日，

张国焘赶到南昌，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张歪曲中央意见，说中央认为“宜慎重”，⁽⁶²⁾国际来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⁶³⁾他还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⁶⁴⁾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都一致反对，争论数小时，因张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第二天（三十一日），再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⁶⁵⁾此时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贺、叶又不敢去。”⁽⁶⁶⁾后张发奎来电说，准一日到南昌。⁽⁶⁷⁾同时得知张发奎不但偕汪精卫来，而且孙科也要来的消息。⁽⁶⁸⁾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遂决定于三十一日晚四时，即八月一日凌晨四时起义。⁽⁶⁹⁾后因三十一日晚二十军营副赵某泄漏秘密，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实际上当晚十二时半即听到枪声，至翌晨六时，将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南昌起义胜利了，张国焘一再阻挠起义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注：

（1）载《百科知识》1982年第8期。

（2）载《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中国现代史》1982年第13期加以复印。

（3）（11）（12）（21）（23）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一九二七），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4）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摘要）》（一九二七年），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5) (10) (13) (14) (15) (16) (17) (18) (19) (22) (24) (28)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6) (48) (49) (50) (51) (52) (53) (59) (60) (61) (62) (63)
(64) (65)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九二七年十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6) (43) (44) (45) (54) (57) (58) (68)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7) (42)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8) 李维汉《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载《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9) 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一书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5) 聂荣臻《南昌起义》一文,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14期。

(26) (27) (29) (66) (67) (69) 《周逸群报告(摘要)——关于南昌起义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30) 朱其华《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一九三三年出版)

(47) (55) (56)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

陕州城第一次解放前后

陕县党政军机构组建情况简介

1947年8月,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陈谢大军挺进豫西。8月11日中共豫西工委(当时驻在山西省阳城县)决定重新组建陕县县委,由在豫西工委工作的蔡迈轮同志任县委书记,随陈谢大军南渡黄河,返回陕县。8月23日,县委在平陆县圣人涧开会宣布组成陕县民主政府,由韩路光同志任县长。8月24日随军渡河,8月26日县委、县政府驻宜村,8月31日移驻菜元乡北湾村,9月17日陕州城解放后驻陕州城内。10月1日成立陕县县大队,由李瑞生任教导员。陕州城解放后全县划分为八个区,因干部不足,只建立了六个区级政权。10月底,解放军主力东移,县委、县政府撤出县城,在县南县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一、中共陕县委员会

书记	蔡迈轮			
副书记	杨朗樵	(1947年9月调离)		
副书记	王重华	(1947年9月任)		
委员	蔡迈轮	杨朗樵	王重华	韩路光
	贾峰			

二、陕县民主政府

县长	韩路光
----	-----